

陳伯達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延安)

陳伯達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169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著者：陳伯達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重印者：西南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發行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
（重慶李子壩220號）

印(92)1—20,000 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西南第一版

目 錄

一	兩種方法論.....	一
二	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	三
三	革命民衆的民主專政.....	三
四	『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首先自己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	三
五	由一個『組織起來』到另一個『組織起來』.....	三八
六	結束語.....	四

在這篇文章裏，事實反映得這樣生動，熱情表現得這樣洋溢，每個句子，直到每個字，都浸透着對於革命和勞動人民之無限量的歡喜，對於反革命和吃人的剝削者之不可調和的仇恨。

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農民與封建勢力的矛盾，構成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內容。當毛澤東同志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恰是革命的實際運動把農民這個問題最突出最迫切地放在革命議事日程的前面，有如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決議所說：『土地問題開始緊急起來，成為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那個階級能够毅然抓住這個問題而給以澈底的答覆，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在這報告中就是以無產階級代表者的資格澈底地答覆了這個革命中心問題（在當時又是最迫

切的問題）。但是，這全篇報告，不僅明明白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掃清了許多人們頭腦中的混亂，表示了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真正的領袖，而且由此提出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一般的革命根本問題，並根據羣衆鬥爭的經驗加以概括，作為當時全黨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總方向。

一、兩種方法論

當羣衆的學生，集中羣衆鬥爭的經驗及其意見，反轉過來，又當羣衆的先生——這是毛澤東同志從來所應用的革命方法論。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應用這個革命方法論的最出色的典型之一。應用這種革命方法論的前提，乃是把羣衆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把羣衆的歡喜當成自己的歡喜，充分信任羣衆的力量，信任羣衆的正確，信任羣衆的將來。掌握這種革命方法論的人，對於羣衆自我的革命發動和革命創造，決不驚慌失措，也不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而是拿出充分的勇敢和毅力去迎接他們，學習他們，並「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使他們獲得結果，獲得勝利。這就是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方法論。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方法論。大家回憶一下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態度吧！又回憶一下一九〇五年列寧對於俄國武裝的工人階級的態度吧！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大匠對於羣衆的「衝天」行動，不是責備他們「幼稚」，不是責備他們「過分」，而是給以滿腔熱情的歡呼；不是隔岸觀火，不是自吹博學，而是和鬥爭中的羣衆在一起，分析和總結他們鬥爭的經驗，作為他們繼續鬥爭的勝利指南針。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和這些無產階級的革命大匠的態度，完全一致。請看毛澤東同志對於當時湖南農民革命的歌頌：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

「……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毛澤東同志完全爲羣衆方面辯護。但這決不是盲目地辯護。這種辯護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實際，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真理。這種辯護是爲打倒各種形式的反革命議論所絕對必要的。要革命，就必要長羣衆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沒有羣衆的狂風驟雨，決不能有大革命，也決不能完成革命。毛澤東同志就是挺身起來，歌唱羣衆的大風雨，並且是對於羣衆進行了呼風喚雨的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你說羣衆的狂風驟雨太粗暴了嗎？對不起！你要懂得革命嗎？這就是真正的革命！我們就是歌唱這樣的革命！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對於革命，給了一個絕妙的科學界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

萬的羣衆，形成一個大的力量。』

你說羣衆會「過分」嗎，羣衆會「矯枉過正」嗎？不錯，毛澤東同志回答說：「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毛澤東同志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根據羣衆鬥爭的經驗所指出的一個重要的客觀革命規律。這是羣衆革命鬥爭的客觀辯證法。革命不是修正舊制度，而是要依靠羣衆的大力量，從事破壞舊制度，而一旦羣衆起來，就會向他們的累代世襲的壓迫者發洩其鬱積的怨憤，就是說，就會『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改良派說，這是『矯枉過正』。但是革命羣衆所越過的『正』，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改良派所劃定的界線，這個界線就是改良派保留舊制度的界線。

當然，不是說，羣衆在鬥爭中不會有任何的錯誤。但是，革命者不能因為羣衆在戰鬥時有時可能有些錯誤而就事先去束縛羣衆的手足，去阻止羣衆衝破改良派企圖保留舊

制度的界線，相反，必須讓羣衆去衝破這樣的界線。應該了解：羣衆也可能有些錯誤，但應該讓羣衆在鬥爭中學習自己的本領，並學習糾正自己可能犯的錯誤。

在物理活動的現象中，我們碰到這樣的規律，即事物的某些運動（這裏是說運動的一種形式，不是說運動的一切形式），在達到它的目的或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時常要或多或少越過它的目的或它的重心。在羣衆革命活動的現象中，也有這樣的規律。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說到普列漢諾夫替法國大革命辯護這件事。普列漢諾夫是這樣寫的：「比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更加厲害的恐怖，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法國大革命底恐怖把真正的金剛力士抬上歷史舞台，它好像「天上的雷雨暴風一樣」光臨法國，毫無情地破壞了「舊制度」底一切殘餘。……它的力量乃是人民革命運動的力量，主張恐怖的人們策略上的主要特點，就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維持和加強羣衆的革命自動精神。這種恐怖，並不是由於對羣衆運動底力量發生「失望心理」所引起的，而是相反的，是絲毫不動搖的，相信這種力量的信念所引起的。」當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他是這麼寫的。毛澤東同志，作為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家，非常特色地鼓勵和信任羣衆的旋轉乾坤的創造力，而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依靠這種羣衆的創造力，集

中革命羣衆的經驗，是能够指導羣衆在合乎歷史規律的軌道上前進的。

在一九二四——二七年革命時代，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這種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方法論相反，還有一種方法論，這就是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孟塞維克的方法論。這類人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時常所稱爲「本本主義」的人。他們口頭也時常談過「革命」的詞句，特別當羣衆還沒有大發動的時候，他們甚至可以把自己描寫成爲了不起的「革命好漢」或「革命英雄」，但他們是在書房中製造「革命」的計劃，繪畫「革命」的圖案，而叱咤羣衆要去按照他們的計劃或圖式走路。如果羣衆鬥爭有點走樣，即走出了他們的計劃和圖案的時候，特別是當羣衆大發動，而根據自己的意志，去「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的時候，那些「本本主義」的人就會始而驚呼：「嚇！嚇！你們果真幹起來嗎？慢點慢點！」我還有錦囊妙計呢！讓我先和敵人談判談判！你們且息一息吧！」繼而生氣：「呸！你們胡鬧！你們完全沒有知識，爲什麼不聽我的命令呢？」終而搖頭嘆氣和咒詛：「世事大變了，真是無法無天，眼看要出亂子了，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讓你們去得禍吧！」如果羣衆果真失敗了，那末，他們的理由就更多了，神氣就更十足了：「活該！我老早就算到了，不聽我的話，活該有這樣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說：「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當然，不但革命戰爭是這樣，各種羣衆的革命活動也都時常是這樣。但這種真理對於「本本主義」的人，是格格不相入的；他們說：「世界上那裏會有這等事呢！世界上是書本出革命，那裏會是革命出書本呢！」這類人一方面害怕反革命的恐怖，另方面害怕革命的恐怖，而且，害怕革命的恐怖，比起害怕反革命的恐怖，是要更厲害得多，所以，他們不會贊助羣衆自我的革命行動，也決不肯向革命的羣衆學習，最後，也就要從革命的隊伍中滾出去。

當農民運動開始發動的時候，陳獨秀所寫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一九二六年九月）就要給農民運動劃定界限。他在那裏寫道：「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羣衆剛在起來，連陳獨秀自己也承認，那時還未打倒了敵人，但是陳獨秀却已不耐煩了，大喊「過左」了。羣衆運動剛在活躍的有利時機，反革命則在設法抵抗，但是陳獨秀却倒轉說是「自己已受很大的損失」以作為限制農民運動的藉口了。陳獨秀又在那裏寫道：「當地主與貧農有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革命以前土豪劣紳所操縱的合

法機關）居調停地位。」陳獨秀對於農村問題的解決，不是要取決於農民羣衆的鬥爭，而是要取決於舊「農會」的調停。調停——這是陳獨秀的根本觀念。他這個根本觀念就是漠視羣衆、限制羣衆和否認羣衆的觀念，就是孟塞維克的方法論。當一種革命的新事物從羣衆那裏發現出來的時候，陳獨秀不是給以正視，衷心地去歡迎它，而是不敢正視，對它表示煩躁。請把陳獨秀這種態度和毛澤東同志的態度比一比吧！孟塞維主義與布爾塞維主義的分別，真是太顯然了。

羣衆的革命規模前進一步，孟塞維克就要後退一步。兩者背道而馳——這是一種規律。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的革命中先後進行了世界上可歌可泣的鬥爭；在英勇的共產黨員領導下，武漢工人階級的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的流血起義——這兩件繼廣東工人階級省港罷工之後而為革命重要組成部分的羣衆英雄事業，不是給陳獨秀這類孟塞維克們歡喜，而是給他們煩惱；偉大的湖南農民革命，又是給他們煩惱再加上一個煩惱。馬日（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事變之後，湖南農民在英勇的共產黨員領導下向長沙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進軍，根據當時力量的對比，這個進軍本來是可以獲得勝利的，但是機會主義者却向勝利的進軍作了失敗的退軍的決定，打擊了羣衆

的英雄主義，瓦解了羣衆的革命隊伍，擴大了反革命的毒餸，助長了反革命的野心。這是對於革命的極可恥的沒有氣節的決定。這是武漢政局時代一個重大的歷史關節，也是當時革命失敗一個重大的歷史關節。接着各種可恥的遏止農民羣衆革命發動的通告就出來了（參考「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自動地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了，解散勞動童子團了。這一切都是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當時全黨許許多多的布爾塞維克精神相反。這一切都是陳獨秀孟塞維克們畏懼羣衆革命發動的不可避免的可恥的結果。

布爾塞維主義積極擁護羣衆的自我革命發動和羣衆的革命創造。但布爾塞維主義和盲動主義有天淵之別。盲動主義的特點是脫離羣衆；脫離羣衆的孤立胡幹（像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那些「左」傾機會主義者所幹的），不能幫助羣衆發揚革命英雄主義，而且適足損傷羣衆的革命銳氣（因為必然失敗）。布爾塞維主義的特點則是聯繫（結合）羣衆，是和羣衆一起來幹，在其決定行動之前，首先要充分估計到羣衆的情緒、組織和力量的配備，估計到羣衆四周圍的各種條件，不落在羣衆的鬥爭之後，而又一步一步地根據實際的鬥爭提高羣衆的革命英雄主義，引導羣衆到勝利的道路。

布爾塞維主義又和尾巴主義完全相反。尾巴主義的特點就是盲目地附和於羣衆之

後，或者從右方面去附和，或者從『左』方面去附和，不能根據羣衆鬥爭的經驗加以概括，去幫助羣衆獲得自己明確的方向，反而使得羣衆可能迷失方向，陷於失敗。這也是脫離羣衆的一種形式。布爾塞維主義則完全是另一樣。布爾塞維主義之所以成爲無產階級和一切革命人民先鋒隊的思想，就是因爲它是生動地概括羣衆鬥爭的經驗，集中羣衆的意見，不但吸取羣衆鬥爭中一切優良的先進的東西，而且捨棄羣衆中那一切由於階級壓迫和迷信因襲而產生的某種不好的落後的東西，向他們提出明確的方向，考慮鬥爭中進攻與防守的各種場合，規定隨機應變的具體戰略和策略，糾正他們可能犯的錯誤，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的所謂『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換句話說：布爾塞維克之所以爲布爾塞維克，還不但是因爲和羣衆在一起，而且更因爲是羣衆的領導者。我們黨有許多這樣的布爾塞維克，所以就能創造出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

盲動主義和尾巴主義在實際上都是孟塞維主義的種類。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中國布爾塞維主義，就是在和中國的孟塞維克及其一切變種的鬥爭中逐步成長起來，成爲不可戰勝的旗幟。

二 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開宗明義這樣提出問題：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問題提得這樣明白，這樣確定，這樣斬釘截鐵。文章發表後幾個月所經歷的事變，完全把上述的思想證明了。十餘年來，革命與反革命的一切最終離合，不但沒有推翻毛澤東同志的論斷，並且益發表現出毛澤東同志的每個字句光景如新。一種理論的是非正

確，必要看它能否經得起實際的考驗，那末，我們對於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正是作如是觀的。

為什麼對於農民革命的態度乃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最終試金石呢？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社會結構回答了這個問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既然是這樣，那末，打爛這個基礎，打平這個牆腳，就是鋪平反帝反封建勝利的道路，而維護這個基礎，維護這個牆腳，也就是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所以毛澤東同志說：『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靠誰來打爛這個基礎，打平這個牆腳呢？就是必要靠農民起來，靠農民革命。你說你贊成反帝反封建嗎？但只要你不是贊成農民起來，不是贊成農民革命，那末，即使你自己主觀上不是要做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辯護人，但也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俘虜了。

中國是這樣偉大的農民國度，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二千餘年來，農民戰爭乃是中國歷史發展真正的動力。在近代中國無產階級產生之前，這個農民階級的鬥爭缺乏自己的領導者而不能得到最後的解